

文化语义视角下《论语》 “仁”的对外汉语教学难点与突破路径

李 馨

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0

摘 要:“仁”作为《论语》核心思想与儒家文化精神内核,是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关键内容,但其文化语义的多层复合性、跨文化逻辑的独特性及实践指向的内在统一性,使其成为教学重难点。本文基于文化语义学理论,结合对外汉语教学实践,先厘清“仁”的语义体系与跨文化差异,再精准定位教学难点,在此基础上,构建“理解—接受—运用”三阶教学路径。研究旨在为儒家核心概念的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参考,助力文化语义的跨文化传递。

关键词:文化语义;《论语》;“仁”;对外汉语教学;教学实践;典籍教学

引言

在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中,典籍教学是传递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重要载体,而《论语》作为儒家思想的源头性典籍,“仁”概念的教学更是典籍教学的核心环节。随着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度的不断加大,越来越多的非汉语文化背景学习者希望通过《论语》理解中国传统伦理观与价值观,但“仁”的教学效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——多数学习者能记住“benevolence”、“humanity”等英文译词,却无法理解“仁”为何是“孝悌之本”,也难以将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与“仁”的实践逻辑关联起来,更无法实现从认知到接受再到运用的能力转化。

文化语义学理论指出,语言单位不仅是符号系统,更是文化信息的载体,其语义内涵由特定文化语境决定(张公瑾、丁石庆,2008)。这一理论为“仁”的教学提供了关键视角:“仁”的语义并非孤立的道德术语,而是嵌套在儒家“修身—齐家—治国—平天下”的伦理体系中,涉及个体修养、人际互动、社会秩序等多重维度,非汉语文化背景学习者因缺乏对儒家文化体系的认知,难以建立“仁”的语义关联网络,导致理解偏差,这也成为后续教学中“接受障碍”“运用困难”的根源。

当前学界对“仁”的研究多集中于哲学阐释与翻译对比,如杨伯峻对《论语》的注释、安乐哲对“仁”的跨文化解读,针对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的系统性研究较少;现有教学实践中,教师多采用“翻译+定义”的传统模式,忽

视文化语境与实践应用,既未解决“语义理解”的基础问题,也未搭建“情感接受”的桥梁,更未提供“能力运用”的路径,进一步加剧了教学难点。基于此,本文结合教学实际需求,在文化语义学理论支撑下,先厘清“仁”的文化语义内涵与跨文化差异,再精准定位教学难点,最终构建适配“理解—接受—运用”认知逻辑的实践路径,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师提供可落地的教学范式。

1 《论语》“仁”的文化语义内涵

1.1 “仁”在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地位

“仁”是儒家思想体系的“道德总纲”,在《论语》中出现频次高达109次,其内涵贯穿个体、人际、社会三个层面,形成了“基础—延伸—升华”的完整语义链,这也为教学中“理解层面”的语义拆解提供了核心依据。从个体层面看,“仁”是内在的道德修养目标,如《论语·述而》中“仁远乎哉?我欲仁,斯仁至矣”,强调“仁”是个体可通过主观努力达成的道德境界,这是“仁”的内涵基础;从人际层面看,“仁”是处理人伦关系的准则,《论语·学而》提出“孝悌也者,其为仁之本与”,将“孝悌”视为“仁”的核心起点,进而延伸出“爱人”的普遍人际准则,这是“仁”的内涵延伸;从社会层面看,“仁”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核心,《论语·子路》中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”,强调统治者践行“仁”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,这是“仁”的内涵升华。

此外,“仁”与儒家其他核心概念“义”、“礼”、“智”、“信”形成紧密的网状关联:“礼”是“仁”的外在表现

形式,如《论语·颜渊》“克己复礼为仁”,“义”是“仁”的价值判断标准,“智”是践行“仁”的认知能力,“信”是“仁”在人际交往中的具体体现。这种概念间的关联性,既凸显了“仁”在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地位,也决定了教学中需通过“文化语义锚定”的方式,帮助学习者建立系统性认知,为后续“接受”与“运用”奠定基础。

1.2 “仁”的跨文化语义差异

“仁”的跨文化语义差异主要体现在概念内涵、伦理取向与实践逻辑三个方面,这既是“仁”的文化语义本质特征,也是教学中“理解障碍”、“接受隔阂”的核心成因。

在概念内涵上,汉语中的“仁”是“情感—伦理—行为”的复合概念:既包含“恻隐之心”的情感关怀,如《论语·乡党》中孔子见“厩焚,先问人,不问马”,也涵盖“道德自觉”的价值选择,如《论语·卫灵公》“志士仁人,无求生以害仁,有杀身以成仁”,还涉及“具体行为规范”的实践要求,如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。而西方文化中与之对应的“benevolence”仅侧重“对他人的善意”,“humanity”侧重“对人的尊重与关怀”,均无法涵盖“仁”的复合内涵,这种差异导致学习者在“理解层面”易出现语义窄化。

在伦理取向上,“仁”遵循“差序伦理”,即根据人伦关系的亲疏远近调整道德实践的优先级,如“先孝亲、后爱人”;而西方伦理思想更强调“平等伦理”,主张对所有人施加无差别的道德关怀。这种差异导致西方学习者在“接受层面”易误解“仁”为“有差别对待的偏爱”,难以认同其伦理逻辑,需通过文化共情引导消解隔阂。

在实践逻辑上,“仁”强调“内在修养与外在实践的统一”,即通过“修身”,如“吾日三省吾身”,达成“仁”的内在境界,再通过“践行礼义”将“仁”外化为具体行为;而西方类似概念更侧重“外在行为的结果”,较少关注内在道德境界的培育。这种差异使得学习者在“运用层面”难以把握“仁”的实践逻辑,易将其简化为“助人行为”,需通过梯度化实践活动强化转化。

2 对外汉语教学中“仁”的教学难点

2.1 文化背景差异导致的语义理解障碍

非汉语文化背景学习者的“文化认知框架缺失”,是“仁”语义理解的首要障碍。儒家文化以“集体主义”、“人伦关系”为核心,而多数西方学习者成长于“个体主义”文化环境,其认知框架中缺乏“孝悌”“礼义”等与“仁”

相关的文化概念,难以建立“仁”的语义关联网。

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:其一,对“仁”的伦理基础理解偏差。例如,欧美学习者常困惑于“为何孝悌是仁之本”,因西方文化中“家庭关系”与“道德核心”无直接关联,更强调个体独立于家庭的道德选择;部分东南亚学习者虽受儒家文化影响,但对“孝悌”的理解多停留在“物质赡养”,难以把握《论语·为政》中“今之孝者,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,皆能有养;不敬,何以别乎”所强调的“精神尊敬”,进而无法理解“孝悌”作为“仁”之“情感源头”的内涵。

其二,对“仁”的语义层次把握不足。“仁”在《论语》中呈现“动态语义”——针对不同弟子的提问,孔子的回答不同,如对颜渊说“克己复礼”,对仲弓说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对樊迟说“爱人”,这种“因材施教”的语义阐释,需要学习者结合儒家“具体情境伦理”的文化逻辑进行理解;但非汉语文化背景学习者习惯“抽象概念+统一定义”的认知模式,容易将“爱人”视为“仁”的唯一内涵,忽视其“个体修养—人际实践—社会治理”的多层语义。

其三,对“仁”的价值取向认同困难。儒家“仁”强调“个人对集体的责任”,如《论语·泰伯》“士不可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”,而西方文化更强调“个体权利优先”,部分学习者会质疑“为何要以仁为己任”,甚至将“克己复礼”理解为“压抑个体自由”,难以接纳“仁”所蕴含的“集体和谐优先”的价值取向。

2.2 语言表达与翻译的局限性

“仁”的语言表达与翻译局限,进一步加剧了教学难点。一方面,汉语中“仁”是高度抽象的单音节词,其语义需通过语境,如《论语》中的对话场景、相关概念关联呈现,而非通过词汇本身的构词法体现;非汉语文化背景学习者习惯“形态构词”,如英文通过前缀、后缀明确语义,难以通过“语境推导”把握“仁”的深层语义。

另一方面,现有翻译无法完整传递“仁”的文化语义。目前学界对“仁”的英译主要有三类:一是“benevolence”,如理雅各译本,侧重“善意与仁慈”,丢失“礼义”、“修身”等内涵;二是“humanity”,如安乐哲译本,侧重“人的本质与价值”,弱化“仁”的实践行为指向;三是音译

“Ren”，如刘殿爵译本，虽避免语义丢失，但需学习者额外理解音译背后的文化内涵，对初级学习者难度过高。

教材中的翻译处理进一步固化了理解偏差。多数对外汉语教材如《中国文化概况》、《论语选读》采用“单一定义+简单翻译”的模式，例如将“仁”直接标注为“benevolence, 仁慈、仁爱”，未说明翻译的局限性，也未补充“仁”的文化背景；部分教材虽提及“仁”的多义性，但未结合《论语》原文案例解析，导致学习者仅能记忆字面翻译，无法理解语义差异。

此外，语言表达的“文化负载差异”也增加了教学难度。例如，《论语·颜渊》中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常被译为“Whatever you do not wish for yourself, do not do to others”，字面翻译准确，但“施”字所蕴含的“主动避免伤害他人”的伦理主动性，以及“不欲”所指出的“道德自觉”，难以通过英文传递；学习者易将其理解为“被动的道德底线”，而非“仁”的实践核心准则。

3 “仁”的对外汉语教学突破路径

3.1 理解层面：文化语义锚定，夯实认知基础

理解是“仁”教学的前提，核心在于通过文化语义解析与跨文化关联，帮助学习者准确把握“仁”的内涵与文化逻辑，避免表层化解读。教学中需以《论语》经典文本为核心，结合学习者文化背景搭建认知锚点：一方面，拆解“仁”的多层语义，从“孝悌为本”的基础内涵，到“泛爱众”的社会延伸，再到“克己复礼”的道德追求，帮助学生由浅入深地理解；另一方面，通过跨文化语义对比消除认知隔阂，将“仁”与西方“仁慈（benevolence）”、东亚“孝悌文化”等概念对照，分析其在伦理起点、适用范围上的异同——例如对比儒家“差序伦理”与西方“平等伦理”的差异，说明“仁”从家庭人伦向社会伦理延伸的独特逻辑。同时，结合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、“仁者爱人”等具象化经典表述，搭配生活场景案例，如邻里互助、尊老爱幼，让抽象的文化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认知内容，帮助学习者建立对“仁”的系统性、准确性理解。

3.2 接受层面：文化共情引导，消解心理隔阂

接受是在理解基础上的情感认同与心理接纳，关键在于通过情境体验与互动交流，让学习者从情感上认同“仁”的价值，避免文化排斥。教学中可通过双重情境设计促进文化共情：一是经典情境还原，选取《论语》中“孔子论孝”、

“樊迟问仁”等场景，通过文本解读、角色代入等方式，让学习者感受“仁”在古代社会的实践形态；二是现实情境关联，将“仁”的内涵与现代生活场景结合，引导学习者思考“仁”在跨文化交往、人际关系维系中的现实意义，例如讨论“如何用‘仁’的理念处理跨国同事关系”、“现代志愿服务与‘仁’的关联”等话题。同时，鼓励学习者分享自身文化中类似的伦理观念与行为规范，如韩国的孝文化、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等，在文化共鸣中弱化“异质性”认知，强化“仁”的普适价值认同，让学习者从“理解其义”走向“接纳其理”。

3.3 运用层面：实践场景落地，实现能力转化

运用是教学的最终目标，核心在于通过分层实践活动，让学习者将对“仁”的认知与认同转化为具体的语言表达与行为实践。针对不同水平的学习者设计梯度化实践任务：初级阶段侧重语言表达运用，引导学习者用汉语描述生活中体现“仁”的行为，或围绕“仁”的内涵进行简单对话、短句写作；中级阶段侧重文化阐释运用，组织“仁与现代社会”主题演讲、跨文化访谈等活动，让学习者结合经典文本与现实案例，用汉语阐释“仁”的文化价值；高级阶段侧重行为实践运用，鼓励学习者在生活中践行“仁”的理念，如参与社区志愿服务、开展跨文化互助活动，并通过报告、分享等形式，复盘实践过程与感悟，说明“仁”的内涵如何指导具体行为。通过“语言表达—文化阐释—行为实践”的梯度设计，让学习者逐步实现对“仁”的全方位运用，真正将文化认知转化为跨文化交际能力。

4 结论与展望

本文以文化语义为视角，聚焦《论语》“仁”的对外汉语教学问题，结合“理解—接受—运用”三阶教学逻辑，得出核心结论：“仁”的教学难点源于其文化语义特征与跨文化差异，形成“认知—情感—行为”障碍链，我们针对性构建了“三阶”路径，有效回应教学难点，对儒家同类文化负载概念词的教学具有借鉴意义。未来研究可拓展至其他儒家核心概念，形成系列化范式；通过教学实验强化实证支撑；结合数字化技术开发情境化教学工具，助力传统文化跨文化传播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安乐哲，罗思文。论语的哲学诠释 [M]. 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3: 78-85.

- [2] 程裕祯. 中国文化要略 [M]. 北京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, 2018: 56-60.
- [3] 孔子研究院. 论语解读 [M]. 济南: 山东教育出版社, 2019: 45-50.
- [4] 钱穆. 论语新解 [M].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05.
- [5] 王宁. 汉字与文化 [M]. 北京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: 90-95.
- [6] 颜世安. 外部规范与内心自觉之间——析《论语》中礼与仁的关系 [J]. 江苏社会科学, 2007,(01):25-30.
- [7] 杨伯峻. 论语译注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7: 12-15, 38-40.
- [8] 张公瑾, 丁石庆. 文化语言学教程 [M]. 北京: 教育科学出版社, 2008: 45-62.